

孔府档案的历史价值

骆承烈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历代统治者一直把它奉为“圣地”。他们在曲阜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孔庙、孔林和“衍圣公府”(通称“孔府”)。

孔府主人凭借历代朝廷所给予的种种特权，保持了自己的优越地位。因而他们对于这些特权以及凭借这些特权搞的活动倍加珍视，大部用文字记录下来，并加以保存，以便作为他们继续进行统治的合法依据。正因如此，孔府虽然覆亡了，却留下了一大批记载孔府历代兴衰的档案资料。

现存孔府档案，起于明代中期(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一五三四年)，到一九四八年曲阜解放为止^①。在此以前，虽然有少量资料，但多系后世追记而成^②。

解放前的孔府只是孔氏贵族的私家府第，孔府档案也只是府内的若干堆废旧文书。曲阜解放后，在清理孔府库房时，在典籍房(册房)中发现了大批文书档案。一九五六年六月，对这批档案进行了整理。

孔府档案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丰富的一份私家档案。它的具体性和基层的特点，有些为中央档案馆档案所不具备。其中大量各历史时期的原始资料，不只记下了这一典型贵族府第的兴亡史，也从各个方面体现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可靠资料。现从下述几方面加以介绍：

一部“圣人家”的兴亡史

孔府档案自一五三四年起，至一九四八年止，中间共经历四百一十四年之久，它从各方面记述了孔府这一世袭贵族兴亡的概况，也从一些侧面反映出我国在这四百多年间的部份历史面貌。

孔府是依靠孔子起家的。历代对孔子尊崇的程度决定了孔府地位的高低。这一点从孔府档案中可明显地看出。孔子被封作“大成至圣文宣王”，圣裔的地位也跟着扶摇直上(〇〇〇六卷之一)。皇帝捧圣裔，圣裔靠皇帝，代代如此。如清统治者刚入关，衍圣公就在顺治元年九月上了个《初进表文》，歌颂新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六三〇八卷之二)。第二年又上了《剃头奏稿》，报告他已集合府内所有人员“遵奉圣谕，俱各剃头讫”(六三〇八卷之二)。这些举动自然博得新主子的欢欣。于是清帝就对孔府屡颁特权：孔子嫡孙承袭“衍圣公”，次子以下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曲阜知县独用孔氏，四氏学、洙泗书院、尼山书院独用学录。又赐给祭田二千大顷及佃户、庙户、乐舞生等(〇〇七九卷之三)。康熙元年九月，授衍圣公孔毓圻为“光禄大夫”，十五年正月又晋阶为“太子少师”(〇〇六四卷之四)。雍正时又特赐“至圣庙执事官四十员”(一六四一卷之九)，这些官爵还可以任意出卖(六六六七卷)。乾隆皇帝多次到曲阜朝“圣”，到处赋诗题词，歌颂孔子及孔道，一些御书碑文拓片也多置于档案之内。光绪二十年，那拉氏庆六十寿辰时，孔府不但专门措集“报效庆典银二千两”送交户部，

衍圣公孔令贻还率母、妻进京祝寿。那拉氏将他们置于坤宁宫内，“俨如家人”，临走时又馈赠物品及赠画题字，他们回府后，令人刻出，置于孔府二堂之内（五四九六卷之九）。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着手复辟活动时，孔府主人又活跃一时。在孔令贻打给袁世凯的劝进电中写着“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君主立宪，已征大同于民意。惟我大总统神圣文武，亟宜早正帝位”（六五九三卷之十九）。一旦袁世凯即皇帝位后，孔令贻马上拍电祝贺，称颂袁“俯顺輿情，允国民之推戴；仰承天命，建皇权之谟猷。化日当阳，慰四海元元之望；圣谟宏运，宏万年丕丕之基”，孔令贻等对此“不胜欢汗鼓舞馨香庆祝之至”（六五九三卷之二十）。袁称帝后，马上下令对孔令贻“著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六五九三卷之一）。一九一七年孔府主人听到张勋复辟后，马上向军阀政府外务部、度支部、参谋部、议政大臣及张勋本人连发八封电报，极力把张勋复辟之举称颂为“日月重光”，对张勋本人夸赞“毅力殊猷”，自己表示“翘首卿云，倾心祝露”（八〇五九卷）。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为扩充自己的势力，继续北伐到达山东时，在曲阜孔庙中贴出的布告中，明确地说明他尊孔的目的“盖欲为共产主义之根本铲除”（八〇〇三卷）。接着，蒋介石亲临曲阜时，孔府主人隆盛地接待了他（八〇九七卷）。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又把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

抗战时期，孔府的主事人、代理奉祀官孔令煜与日军紧密勾结，向日军多次赠送礼品（八八九一卷），请日本侵略军头目过府赴宴（八九一四卷）。日伪联合筹办的“东亚新秩序大会”在孔庙奎文阁前召开时，孔府恭恭敬敬地派出代表参加（八九一五卷）。一九四二年孔令煜在一次日伪举办的祭孔大会上，与侵略者一同唱起“同文同种”的调调，表示和日寇采取“一致行动”（八八八六卷之二四）。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汪伪政权麀集三周年的时候，孔府拍去电报，将其投降卖国的行径誉为“旋转乾坤之功”（八九五〇卷之一）。这些，都表现出孔府主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不惜向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献媚的丑态。

“与国咸休”的孔府确实与反动的国相休戚。清王朝被推翻，它便失去一部分特权。

大革命的洪流，冲击了孔府的统治。尤其蔡元培等提出将孔庙孔林收归国有的提案以后，孔府闻之，更如雷轰顶，孔府马上向全国发出呼吁，乞求各地的旧势力对其支持。明清时期明文规定佃户按时向孔府交纳的一些实物，民国以后实际上收不起来，孔府只好下令“一律免除”（八九八三卷）。当年在集市收税之事，也不得不让与蒋政权征收（八八六八卷）。

抗日战争前后，孔府佃户很多不纳租税，致使孔府对各庄管事催租的谕令一个接着一个（八七七四卷之三、五、六、九等），甚至孔德成专程到兖州晋见军阀韩复榘，要韩以武力逼泗水一带佃户“速交今年田租，并带一年陈欠”（八二七七卷）。

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孔府依赖的最后一个“国”。因此，孔府主人在临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也必然要挣扎一番。在蒋军兵败如山倒的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孔府曾“助昌潍守城将士洋一百万元”（八九七八卷）。在曲阜解放前夕，孔府主人还写信给国民党十二军军长霍守义和兖州天主教神父，要把一部分古物暂存兖州天主教堂，日后伺机运走。虽然这批文物最终还是回到人民手中，但却反映了孔府主人与人民为敌的态度。

典型的贵族地主庄园

从孔府的档案中反映出，孔府是一个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地主庄园。孔府土地的来源，一是封建国家赐与的祭田，一是孔府向民间自置的田产。这些土地跨鲁、冀、豫、苏、皖

五省。孔府档案中除对土地的综合记述外，每部分土地坐落地段、四至、亩数，各有细账。

孔府的祀田到底有多少？历代变迁，谁也说不清。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孔府管家孔令恂在回答青岛天主教堂神甫鲍润生的信中有一段记着：“历代帝王封赠孔氏奉祀祭田共大顷三千六百顷。每顷一百大亩”（八一—五卷）。依此计算，应有一百零八万市亩之多。这一数字当然并非绝对可靠，但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孔府的土地多以祀田（祭田）的名义出现，但祀田的剥削方式却有多种多样。如“屯地每大亩征正耗丁银八分八厘六丝三忽。其地许屯户买卖，赴屯官处过粮更名，粮银由管勾征解。犹似乎朝廷大粮地亩，只征粮银听民买卖也。其厂地按地亩之高下，分别等则，输纳租银。其官庄有分收籽粒者，有征收租粮者。其租额视地之厚薄不等，皆为招佃耕种”（四九二四卷之五）。

其祀田采用定额租，但自置田产却采用分成租。孔府与佃户名义上是对半分或四六分，但却要加上成倍的种子粮，有的还有牛租，实际上榨取租额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四八一八卷之一四）。孔府所属的独山屯，地势低下，常被水淹，农民栽藕养鱼，要交草租、鱼租（四一二一卷之四三），有的要交藕租、芦苇租等（四六〇二卷），对昭阳湖的船户征收船租（四八三四卷之一八），还收一些宅基租（四八二六卷）等等。

孔府除迫使佃户交纳租粮外，有时还将租粮折成租银。收租银时又有加耗（三七三六卷之一三）、解费（四一一〇卷之一六）以及任意抬高银钱比价（六七四〇卷之一四）等办法。致使佃户对这个“巍巍公府……任意索取，无有定数”的苛重剥削多次进行控诉（四一〇二卷等）。其他又如斗尖、地皮、合子粮的特殊剥削方式（四七五〇卷），竟至出现“斗外之米，往往多于斗内”的现象（四一三四卷之一）。

“安富尊荣”的孔府主人为了更大限度满足其享乐的贪欲，又挖空心思地对农民进行各种名目繁多的额外剥削。在明代的档案中就有令佃户交纳租炭、制作卷箱、交纳金银纸箔、征收年例布花、年例银两、自带工具修墙等记载（见六十卷之六十三、七十六、七十四、四十六、六十六、七十一）。清代以来，又有令佃户交纳鸭蛋（六三九五卷），派冰冻差（六七三一卷），令屯、柜、厂户出天棚资（八四六一卷之一），令佃户运输林柴（八四六四卷）、交花炮差（八七六一卷），交花炮、杏仁、肉腿、干果、年菜、椿芽等杂差费（六七三一卷）以及封建皇帝到曲阜朝“圣”时，加派黄、兰、红布，席、箔、竹竿，给戏班添办行头等项目（五一四五卷之八）。更有甚者，孔府办丧事时还要屯户服役、戴孝和捐款（一三二四卷之八）。不仅租种孔府土地的佃户如此，即使专司为其服役的庙户、洒扫户、仆人等也不幸免。

孔府对农民剥削的花样还有很多。如出卖集头、集市收税、开钱庄、当铺、放高利贷以及卖官鬻爵等剥削方式，在档案中均屡见不鲜。

孔府主人靠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寄生生活。在一九三六年府内的一份收支帐中记着这一年利用地租、地税、房租、杂派等方式“共合收存洋九万八千七百九十一元三毛五分四厘，钱四万一千九百八十四千八百七十文”（八七六三卷）。

尽力宣扬“四权”的样版

孔府大门两旁挂的一付对联上写着：“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充分体现出孔府与历代统治者关系密切，依靠封建统治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特点。一九二七年孔府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说：“今共逆直接间接尚思乱国人之耳目，辄指孔道为不合时宜”（八四三七卷）。明确地道出他们利用孔孟之道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动目的。

封建的宗法制度是反动政权的支柱，族权统治在孔府尤为典型。孔府档案中存有大量族谱、族规、家训。如在一份《祖训十戒》中，就规定了春秋祭祀、谱牒之设、崇儒重道、优免差徭、婚姻嫁娶以及孔氏族长的职权。

历代统治者利用封建的旧礼教统治人民犹嫌不足，往往又搬出神权来为其服务。神化孔子的例子如“先圣诞生之夕，有二龙绕室，五老降庭……空中有声云：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箫之音”（一〇五五卷）。

旧礼教的“三纲”中明确规定“夫为妻纲”，《孔氏族规》中明确规定：“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还规定“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一〇六一卷之二）。孙府档案中宣扬夫权，鼓吹男尊女卑的资料甚多。

人民反抗斗争的记录

历代人民的反抗斗争，冲击了反动的政权，不同程度地打乱了他们的统治秩序，因而历代统治者对此讳莫如深。在孔府档案中有大量收租的材料，里面不时出现佃户抗租的内容。如明万历十一年，巨野屯屯长王梅去向佃户郭礼催租时，郭“上房掀瓦，将梅头颅砍破，昏倒在地，亏众救回。称说‘五、六年不纳钱粮，以（己）不见如何’”（〇〇三〇卷之一）。清雍正十二年，汶上县新庄小甲吴廷瑞去佃户薛衍智家催租时，薛不但“分厘不纳”，“反触虎怒，兄弟三人，手持铁棍，各带凶器，将身头颅打破，几至丧命”（四一三八卷之一）。

曲阜现存碑文中记载农民起义的材料有七、八处，孔府档案中更多。如明天启年间，徐鸿儒起义不久，在鲁西南一带孔府的祭田上，到处发生农民起义，“连年以来，妖寇乱后，奸宄未能尽除。贼盗接踵，生民日切寒心，内外惊惶”。佃户罗登等也入伙起义，孔府“欲行捕捉，奈人力不□（足）……况盗贼极多，寡不敌众”，而勾结郛城县会同镇压（〇〇三三卷）。

清朝以来，各地农民反抗者更多。六三五五卷中就有四处记载清统治者虽已入关五年，人民仍在地方上不断进行反抗的资料。康熙年间，孔府佃户、泗水盐民起义，逼得孔府会合泗水一带的地方官“拨各路员兵，四处剿除”，后来起义军首领孔振公被捉，“解至长清县张夏地方，绝食身死”（四九一二卷之四）。

民国以来，人民反抗斗争的记载也很多。如曲阜一带佃户借土地升科，拒纳租银（六七四四卷之四），泗水戈山厂等十七村向外发出通告，串连抗租，佃户张方策等抗租退佃（六七四六卷）。泗水西岩庄等三村“七、八年抗租不交”（八七七六卷）等。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得知：档案工作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历史档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历史的见证。

注：

- ① 时间最晚的一件是八九七八卷《一九四八年一至六月收入款项流水账簿》。
- ② 其中〇〇〇六、〇〇〇七两卷《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系其后的印刷品。